

往来津渡 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历史交流

□记者 黄燕玲 通讯员 叶玲



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,也是中韩文化交流年,以此为契机,我市积极推进中韩民间文化交流,举办了多项活动。

9月16日,由舟山博物馆发起、中韩两国学者共同参与的“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历史文化交流”国际学术论坛在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举行。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交流由来已久,论坛上学者专家各抒己见,探讨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在经贸、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。

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历史交流,要从两地之间的洋流说起,这道洋流,构建了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海上航道,拉开了历史的大幕。



论坛现场(市博物馆提供)

经贸往来,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

早在史前时代,中日韩之间便有了海上往来,河姆渡人采用原始的竹筏,利用洋流,通过漂流的方式,把浙江的稻作文化等经舟山群岛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。

为验证这条古老航道的存在,韩国东国大学名誉教授、韩国海洋政策学会副会长尹明喆,同时也作为一名海洋探险家,分别于1997年和2003年从舟山出发,进行竹筏漂流探险并获得成功。1997年那次他历经17天,越过东海、黄海,成功在黑山岛登陆。

他经历的航线正是宋代官员徐兢出使高丽时曾行驶的航线。宣和六年(1124),徐兢以“奉使高丽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”的身份出使朝鲜半岛。归国后,作《宣和奉使高丽图经》一书,其中记载自己前往高丽的路线,从宁波出发,途经舟山,在沈家门、普陀山、岱山稍做停靠后一路向北,到达朝鲜半岛。

尹明喆的竹筏漂流不仅印证了舟山和朝鲜半岛之间古老航道的存在,也印证了舟山在“东亚地中海”中的特殊位置。提起古代航线中链接浙东地区的南部航线,舟山是绕不开的一个港口。

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舟山群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峰表示,中国古代通往日韩的航线主要有三条:北部沿岸航线、中部横断航线和南部斜断航线。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,南部航线越来越受欢迎。尤其南宋建都临安后,江南经济飞速发展,经贸往来更为兴盛。大量的高丽商船从宁波出发,满载丝绸、茶叶等产品,前往高丽。贸易之兴盛,从宁波开设有专门的市舶司可见一斑。

然而,古代船只没有动力系统,航行全靠风帆和洋流,从江浙一带前往朝鲜半岛,最适宜的是西南风。高丽船只从宁波出发后,需要在舟山候风。舟山,是他们的候风港,也是补给站。

舟山众多岛屿中,普陀山备受欢迎,日本与新罗的遣唐使、僧侣或商人经常在此停留。宋代地方志载:“梅岑山,在县东二百七十里,四面环海。高丽、新罗、渤海诸国皆由此取道,守候风信,谓之放洋。”

为此,普陀山有许多古朝鲜人留下的痕迹。普陀山曾经唯一的埠头叫高丽道头还有一处名为新罗礁的礁石,都侧面反映了当时经停普陀山的朝鲜半岛商船数量众多。

天然的洋流优势除了让船只顺风顺水往返于两地,也给舟山带来了诸多的“漂流民”,即遭难的船夫或船客。

舟山相关史志典籍中,最早关于救助朝鲜半岛漂流民的记载是南宋开庆年间的《四明续志》,其中《收养丽人》一文中记载,宋理宗宝祐六年(1258),花鸟岛漂来因买木材遭遇大风的高丽船,上面6位高丽人成功获救,“且从本司日支六名米各二升,钱各一贯。及归国,则又给回程钱六百贯”。

盛情款待、全力救助,足以彰显自古以来的大国风范。

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史学科博士,高丽大学亚细亚问题研究院研究委员戴琳剑在对梁知会的《漂海录》和崔斗灿的《乘槎录》研究过程中,进一步还原了舟山人大爱精神。

1818年农历四月初十,一艘船只从济州岛出发,船上有几十位客人,其中有受命前去济州送粮的梁知会,也有在老丈人家做客结束返程去往全罗道姐夫处的崔斗灿,都是有一定名望的士族文人。船只在海上遭遇风浪,桅杆被吹断,只能一路漂流。15日后,一船人幸亏遇见了一艘渔船,船上渔民给了他们一

人道主义,救助漂流民的爱心港湾

些食物补给。戴琳剑推测,当时船只已经漂到了舟山海域,给予他们帮助的是舟山渔民,第二天,梁知会等人果然在普陀山登陆。

梁知会在《漂海录》中记载,他们上岛后,得到当地人解释:“此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也。”在梁知会的笔下,普陀山繁华美丽:“熟石铺径,而洞口水田有苗青,青中有大池,水光莹莹,余等从目聘览,浮楼飞阁,丹碧照辉,金瓦玉甍,杂以青红。”

当地僧人安顿好他们之后,便向定海县进行了汇报。随即便有官吏把他们接到了定海。

因为《漂海录》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定海的描写:“青雀黄龙之舳,不知其几万数也。试览浦口,台榭纵横,墙壁照辉,层栏鬼阁,半入云霄,豪男美娥,相筹歌酒,使人迷眼,不可名状。”戴琳剑认为,定海县很可能设立专门的房舍供漂流民居住,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自由出入。

梁知会一行在舟山期间,受到舟山官员频频“茶面饼肉酒菜”招待,舟山的文人也以文相交,以诗会友。随后他们一行又交由宁波方进行安置。离开舟山时,舟山文人纷纷前来

送别。舟山人给予的盛情招待,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,回去后两人前后出书,并进行了记录。崔斗灿对江南的喜爱,让他在回国后,重新建了一间草屋,并命名为“江南亭”,成了江南在当地的“代言人”。

此类漂流民的救助还有很多。孙峰从史料中发现,道光十二年(1832),有一起朝鲜国苗浦船员在舟山遇救事件。

这群漂流民在嵎泗壁下山被救后,渔民将被毁船只内的米、豆、衣、包等物打捞上岸,见他们无处安身,又给他们凑了一千二百文,将他们送到了普陀黄舵岙。舟山的官员将船上被浸泡的米豆船料等照估变价,就连沉失的米物也算在内,又从自己的俸禄中贴补了许多,共计银钱六百两。后上报宁波府,听候转送回国。

清乾隆年间就有相关规定,“外国船只遭风漂至境内,著加意抚恤”“赏给衣粮,修理舟楫,并将货物交还,遣归本国”。

舟山,这座漂流民“靠岸”的第一站,无论是民间,还是官方,救助都体现着一个海洋城市自古以来的人文温度。

文化交流源远流长

频繁的海上往来,也带动了古代舟山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。

戴琳剑在朝鲜时代济州牧使李益泰的《知瀛录》一书中,发现了与舟山相关的资料。1687年朝鲜人金泰瑱等24人漂到越南,次年21人在越南乘坐宁波商船回朝鲜,途经浙江舟山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腊月初八,他们登上普陀山候风,院主“甚喜”,写下了一首诗赠与他们:万国原来只一家,衣冠文物等中华。有缘得晤诸公面,千里风云信手拈。”

市作协副主席孙和军对普陀山院主的诗歌进行了研究。他分析,诗中“万国原来只一家”指的是中华朝贡体系下,存在于东亚、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,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。通过中华朝贡体系,中国文化逐渐被传播到朝鲜、琉球、日本、越南等中国的邻近国家,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、社会结构、世界观念,最终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。到了明清两

朝,中华朝贡体系到达了巅峰水平。

而“衣冠文物等中华”也是院主“甚喜”的主要原因之一。自南宋初箕子东走入朝建立朝鲜开始,“衣冠制度,悉通乎中国。”韩服形成于朝鲜李氏王朝,对应的是中国的明朝时期。朝鲜皇族的服饰乃大明“赐服”,李成桂确立了“袭大明衣冠,禁胡服”的政策。

院主见到这些漂流民时,已是康熙二十七年,当时距明朝灭亡已有40余年。清人入主中原后,改换服制,大明衣冠只能在朝鲜使者的身上见到了。对当时很多人来说,大明衣冠不仅是情感的寄托,更承载着自古以来中原王朝和朝鲜的历史渊源,承载着中华文化圈文化人的精神思想。孙和军认为这是让院主真正感叹的事。

除了漂流民带来的民间文化交流外,两地文化交流中,还以佛教文化交流最为引人注目。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楼正豪在这方面颇有研究,他表示,古代朝鲜

文士们通过阅读朝信使、燕行使带来的中国书籍,很多人都知晓了中国的普陀山。例如朝鲜后期实学家李奎景写了一套百科全书《五洲衍文长笺散稿》,其中就写到了普陀山有三,分别在印度、西藏布达拉山,以及“浙江之定海县海中”。

在韩国,也有一处和普陀山相似的观音道场,即建在韩国海边的洛山寺。说到这个寺庙,不得不提洛山二大圣。起初洛山寺是由新罗高僧义湘大师从唐朝留学归去后所建,多年后,又由另一位高僧,禅宗九大宗派创始人之一崛山祖师梵日重建。楼正豪推测,梵日在重建洛山寺时,多少受到了舟山普陀山的影响。因为梵日于太和年间(827-835),在浙江宁波、海盐一代留学,学成归国时,舟山是他归国之路上的必经港口。

“舟山的观音文化影响深渊,对日本、韩国都有影响,这和舟山作为港口城市不无关系。”楼正豪表示。

你的亲人在家里等你

交警蜀黍在路口等你!

开车不喝酒
喝酒不开车

舟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宣